



Esthetic of Handshake by Left and Right
左手握右手的美学
高千惠 Gao Qianhui

1.

公共空间的行为或行动，无法脱离与社会对话的意涵，而集体性的表达模式，原有“政治美学化”与“美学政治化”之别，但在今日，“政治美学化”与“美学政治化”，已不仅是一部“左手握右手”的“交叉-美学”论述，更是常见的创意性活动演出了。

关于“艺术行为”和“日常行为”、“政治行为”如何区分？依当代艺坛不負責任的美丽说法，便是“已经疆界模糊”或“去-疆域”。事实上，除了故弄玄虚，我们都知道“当然有疆界，只是边线的定位随言说挪来挪去”。个人可以挪出的抽象边线定义便是：“艺术行为”和“日常行为”的边界，在于前者放大了后者，并扩张出一些意义；“艺术行为”和“政治行为”的边界，则是前者缩小了后者，并消弭了一些意义。

2010年，德国柏林大学提供了一个针对社会文本创作研究的学位(Art in Context)。这门课程在于教导作为社会一份子的艺术家，其工作认知不是单纯的自由创作而已。他必须专业地了解其社会情境、机制系统、其它社会人文的组织概况。尽管，不是每一种类型的艺术家都需要这种社会性的演练，但一旦你的作品是发生在一个公共性的时空里，除非你刻意挑衅，你必然要担负可能的风险。

例如，你在公共汽车内猛抽烟或制造噪音，说是在“测试公众忍耐力”或“人身自由表述”，还希望交通部保障你的自由行动安全，被开罚单或抓走时，便宣称是艺术行为遭受迫害，这在成熟的公民社会，很难被认同。但是，如果你决定在公共场合猛放屁，而且你可以自我将身体调控得很好，我们只能说这个“Cutting edge”通过，不算违法。但这算不算艺术行动？您若要如此自我陶醉，他人也不便置喙。今日艺术家在接受一些公共议题方案时，能够作的安全路线，便是“建设性”或“放屁性”二条非暴力路线用这

个例子。然而，凡事物皆一体两面，这些演练的终极，也可能把自由活泼的艺术家变成奉公守法的艺术公务员，或是痞性十足的艺界浪人。

2.

艺术行动中的美学和政治之复杂关系，有其长远悠久的历史，同时也存在着右派和左派的版本。而美学与政治的结盟，在左倾和右倾的团体，也都出现过。过去，极左的方式被称为“美学政治化”，极右的方式被称为“政治美学化”；而在当代文化社会，这二者已成为混淆而相互为用的工具。

原先，“美学”曾被美学之父鲍姆嘉登(A.G.Baumgarten 1714-1762)，定为有关艺术的理论。在他1750年的《美学》一书，不仅宣告美学为一门独立学科，还设定是一门研究人的感性认识之学科。在后来黑格尔(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, 1770-1831)的《美学》中，则又以客观唯心论和辩证法来研究美学，认为艺术是绝对精神的体现。此“绝对精神的体现”之理念，与其充满矛盾和对立的辩证方法，为求统一和整理而反复思考，已将“美学”引导到哲学性和政治性的层面。黑格尔所领导的美学概念，还只限于高雅艺术的学问，因为在这美学理念里，

只有高雅艺术才能提供精神的陶冶。但黑格尔之后，尤其是20世纪的许多艺术论述，都不再是传统美学的概念，而是视觉文化领域的一部政治哲学史。

回溯20世纪西方美学史，所引用的理论和所呼应的社会情境，基本上，便是一部以艺术之名的政治思想史。相对于“美学”而出现的“反-美学”，所涉及的领域，便是把美的诠释，扭转到政治性的诠释。但不论是“美学”或“反-美学”的支持者，其立场也都具有政治的，因为在支持或声援的过程，一样要透过组织、展览、媒体等行动，灌输其打造或拼装的言论。而包装这言论的最美丽词汇，便是既中性而又具有深度联想的“美学”。

是故，在美学已被解放的今天，我们所言称的美学，已不再是视觉的美感或形式的问题，而是一种被合理化的论述。这个被合理化的论述，不是仅针对一个案例，而是变成一个被内化的系统，甚至成为一方霸权，或强制造成一种趋势。美学变成一种政治力，当一个命名成立，便可以无限繁衍，成为一种具有磁性的符号。这种标签化的指认，在当代艺术文化界已相当普遍，甚至让人看不出是“政治的美学化”或是“美学的政治化”。因为，艺术和政治，已变成“表里”的相互为用关系，而不是两个独立的领域。而当“美学”与“政治”成为当代艺术的论述承传，所有的观念、行为、装置、影录、网站种种被视为非形式美学的表现方式，其实都只是传播媒介，真正的“美学”，变成“话语权”的设定。

3.

关于“政治的美学化”一词，其重要论述来源是本雅明(Walter Benjamin, 1892-1940)的《德国法西斯理论》(Theories of German Fascism, 1936)。他提出法西斯主义的本质，就是一种“政治美学化”(The aestheticization of politics)的实践。政治是生活的一切，其结构、形式也都要像艺术一般，产生一种美感。他甚至把肉搏战争和科技战争，与手工艺术和科技艺术的精神情境作了比拟。认为科技武器的使用，消除了过去肉身战士的仪式性、精神性和理想性，最后变成科技造反，而不再是人的战争情绪问题。他也从现代大规模的战事中，看到一个集体行为下的美学，即“军服”的象征概念。本雅明指出，战争中，被包裹在制服里面的人，都必须为一种立场效忠，他们寄身于英雄主义的形象要求，却又成为“为战争而战争”的科技武器操控者。他也以法西斯式的文宣为例，认为这种科技下的集体行为，使其行动本身变得越来越无技艺和感官上的美感，而是一种快速的、视觉的、形式的、策略



的表现领域。

这是本雅明以1920年代法西斯意识形态的转化为观察目标，把政治性的行动，赋予了一种美学心理机制的转化研究。从此处，可以看到本雅明的观点。他视资产阶级(优势科技发展)的英雄主义，是一种虚无主义。用在美学领域，或与艺术境界作为一种交流，本雅明提出了类似情境。他指出，人们若为自己而表演，疏离地去经历自身的毁灭，或是以自身的毁灭当作一种美感的享乐，这就是法西斯主义政治运作下的美学化。这说法，在其《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》一文中，同样有所呼应。他视科技是晚期资产阶级及其美学的自我反照，乃是基于资产阶级自身的欲望，而转化出的新的生产机制。他在内文中提出“现实”与“再现”之间的不同价值判断。而这不同的不同价值判断，正留给阿多诺(Theodor Adorno, 1903-1969)对《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》一文的响应空间。

一般引例，“政治的美学化”早期经典的装置性代表，是法西斯时代，于纽伦堡举行的兹佩林运动场(Zeppelin Field)。兹佩林运动场是纳粹党集会聚点之一，1934年至1937年间由建筑师史皮尔(Albert Speer)策划，把这个政治集会活动变成一件艺术品或一项艺术行动，制作出集体排练出的壮观视效。这样的声势在后来许多国家的国庆活动、阅兵仪式中都可以看到，在人头方便使用下，有规划的人海杖阵更是演练出数大为美的感官视效。而今日，非关法西斯，许多社政活动也重视壮观或奇观的视效。例如，原本属娱乐竞技的身体运动之美学，在制服或旗帜的装备之下，同样要充满意识和意志扩张的意味。而一些区域的街头运动也常把集会办得像超大型综艺活动，比当代装置艺术还前卫地占据空间，大成本地完成其聚众参与的方案，兼顾了“整体的美感”或“舞台的效果”。

4.

相对于“政治的美学化”，原属于左派的“美学的政治化”，亦采用类似的手法，把批判性的思想或行动也美学化。如果说，“政治的美学化”在于歌颂政治和纠结群体力量，“美学的政治化”则是把文化活动当作社会的急先锋，发掘文艺的潜能，以便批判当下，实践思想理念的目标。几乎所有的前哨艺术，都带着这种政治性或批判性的色彩。在现代艺术史，意大利的未来主义运动和布荷东(Andre Breton, 1896-1966)等人倡言的超现实主义，

#1 退思堂 布面油彩·丙烯 陆春涛
#2 北方森林 版画 牟学谦



通往城市的路9 纸本彩墨 左正尧

均是“美学的政治化”之例。“美学的政治化”，在20世纪的艺术运动史中，一度成为与苏联式政治意识形态有关的名词，而后，有关具政治性质的艺术论述，亦被纳入此反-美学的体系。

近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，几乎都是积极的政治参与者。他们往往将文艺理论和美学的思考，纳入其政治思维的总体范畴之内，形成“美学的政治化”之脉络。例如，早期的左派论者，乃至法兰克福学派，都主张以“总体”或“宏观”的概念，将文化和经济政治放在同等的高度，并对文化生产、消费模式和劳动生活、集体精神分析等变迁，视为一个总体性的革命问题。

面对艺术概念的转变，20世纪遂产生了许多以宏观角度看待文化生产问题的美学家，而这些美学家，多是政治、历史、哲学的思考者。马克思主义理论先驱卢卡奇(Georg Lukacs, 1885-1971)，乃从现实主义出发，认为文艺创作者要通过现实主义的掌握和实践，以便战胜或克服一些消极世界对创作的影响。而萨特(Jean-Paul Sartre, 1905-1980)则从存在主义出发，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存在与异化的现实，提出尖锐的对抗。这二条论述路线，都提出要用“介入”的创作形式，表达其社会政治和哲学观点。马克思主义美学，曾把艺术生产当作无产阶级革命事业。至于存在主义美学，虽没有直接表明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之需要为出发点，但却在左派的学生运动中产生影响力。尽管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后期的哈伯马斯(Jürgen Habermas, 1929-)也曾批评，将批判思想美学化，乃是“新保守主义”的同谋，但美学这个概念，本身便充满矛盾的、双面的语境。它(美学)表面上在“解放”，实则在“内化”，以便扭转出另一种霸权形势，或所谓的意识形态。

“政治的美学化”与“美学的政治化”之相互瓦解正在发生。我们看到“政治的美学化”继法西斯主义后，在资本主义社会更是获得了延展。于科技传播发达的今日，这些“政治的美学化”包括：形象操弄、神化偶像、亲善公关媒体、正当化口号政策、激发群众集体认同，出现“作秀社会”等等。至于“美学的政治化”，现在则变成许多后现代主义的重要哲学根源，甚至从“人的存在”转变到“物的存在”。今日，“审美对象的变化”，不仅变成“艺术”的文化；“物质文化”研究也变成新的“艺术史”阅读角度，以至于“大众化”、“日常生活化”的对象美学或对象生产流程，都是当代美学的重要透视角度。当代，我们更可以看到“流行美学”、“大众美学”、“常民美学”、“影像美学”、“科技美学”、“身体美学”等名词相继出现。凡属当代生活和文化现象之事物，在作专题显影时，只要在名词后面加上“美学”，便有了论述的概念。

当代意大利政治论者兼法西斯和未来主义研究者金泰尔(Emilio Gentile, 1946-)，便认为“美学的政治化”是在将政治性质之事物神圣化。但对他而言，“美学的政治化”与“政治的美学化”并不冲突，甚至有程度性的相似。正因为如此，面对左手握右手的当代美学，也无怪乎我们的美感经验在日趋无感中。



都市·行走NO. 6 木版 690X600mm 2009年 第十一届全国美展作品 李仲